

城乡二元结构转换 过程中劳动收入占比演变

——兼论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成因

张松林 孙文远 程瑶*

摘要: 基于新兴古典经济学模型的微观框架,本文在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作为切入点,研究城乡二元转换过程中劳动收入占比演变规律。一方面,当市场化改革推动产品和劳动市场交易效率达到足够高时,农村劳动力有动力转变为“全职工人”,而在劳动市场“谈判能力”方面具有绝对优势的厂商却有动力只招聘“兼业工人”,并维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来巩固自己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劳动收入占比随着市场化改革中产品和劳动市场交易效率的提高而下降。上述两方面共同促成了中国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对此,提高农村劳动力在劳动市场上的“谈判能力”,转变分工结构,以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兼业工人”向“专业农民”和“全职工人”转变,能够减弱在市场化程度较高时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对劳动收入占比的负面效应,提高劳动收入占比水平。

关键词: 农村劳动力 交易效率 劳动收入占比

一、引言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2013年2月,国务院根据十八大精神制定并批转了《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其主要目标便包括“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逐步提高”。在目前收入差距已然较大的背景下,上述“收入倍增计划”的出台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其将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同时也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课题:“如何实现收入倍增?”对此,新一届政府筹划的一条重要实现路径便是大力推进城镇化,这将在推动经济发展

*张松林,南京审计学院分工与超边际研究所,邮政编码:211815,电子信箱:zhslwxn300@126.com;孙文远,南京审计学院分工与超边际研究所,邮政编码:211815;程瑶,南京审计学院公共经济学院,邮政编码:211815。

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测算方法构建、多重因素分解与刘易斯拐点逼近后的政策治理思路”(项目号:12YJC790017)、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城市化视角下劳动收入占比决定的理论与实证研究”(项目号:2013SJB790036)、“南京审计学院校级重点学科——应用经济学”(南审研发[2013]18号)的支持,同时感谢澳门理工学院科研基金(RP/OTHER-02/2013)的资助。非常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建议及编辑老师的认真工作!但文责自负。

的同时,缩小构成我国收入差距一半内容的城乡收入差距,提高广大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然而,《今日美国报》2013年2月3日的文章《大搞城镇化,中国移平700座山》指出,大搞城镇化若搞砸了,今后20年中国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城市会遍布大型贫民窟。这又引发笔者深思:中国正在进行着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化,且快速城市化在今后将长期存在,在这一过程中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如果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趋势继续下去,那么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特征较为显著的背景下受到影响最大的便是这些转移到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城市贫困将会日益凸显。假如这种情况发生的话,那么在中国城市内部将会出现另一种“二元结构”,即这些转移到城市的居民与城市已有居民之间的二元分割。这实际上是将中国目前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问题转变为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问题。为了避免这一问题的变相转化,本文将重点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作为切入点来深入研究城乡二元转换过程中劳动收入占比演变的内在机制,并对中国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进行解释,在此基础上提出化解机制。

劳动收入占比问题是经济学研究中的一大热点,目前关于这方面的文献非常丰富。总体上看,已有文献在研究决定劳动收入占比时所考虑的因素主要包括:(1)产业结构变化(如 Kongsamut, et al., 2001; Askenazy, 2005; 李稻葵等, 2009; 罗长远、张军, 2009; 白重恩、钱震杰, 2010; Hutchinson and Persyn, 2012); (2) 全球化(如 Harrison, 2005; Deceuse and Maarek, 2008; 唐东波, 2011); (3) 偏向型技术进步和不完全竞争市场(如 Acemoglu, 2003; Bentolina and Saint - Paul, 2003; Kessing, 2003)。这些文献加深了我们对劳动收入占比决定机制的理解,也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拓展了范围。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劳动收入占比的演变具有自身独特的特征(Kabaca, 2011)。对此,伍山林(2011)认为,造成这一情形的可能因素在于微观层面。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最重要的一种微观主体是在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随着城市化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农村劳动力。由此可见,以二元经济结构下无限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作为背景,从微观层面来研究城乡二元转换过程中劳动收入占比的演变规律,更能揭示出发展中国家劳动收入占比的内在决定机制。本文将重点对这一议题展开研究,并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创新:首先,我们以内生分工结构演进为逻辑思路,将农村劳动力和厂商之间在劳动市场上相互决策的“谈判能力”纳入统一的模型框架来厘清城乡二元转换过程中劳动收入占比演变的微观机制;其次,我们从分工结构转化的角度对中国劳动收入占比的持续下降进行解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化解机制;再次,市场化改革^①是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必然选择,为此,我们也重点研究市场化改革对城乡二元转换过程中不同分工结构的劳动收入占比演变规律的具体影响。

二、城乡二元结构转换过程中劳动收入占比决定的微观框架^②

基于城乡二元转换过程中无限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的背景,模型设定思路以农村劳动力(这里也包括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进入城市厂商的工厂工作)来展开,在这一过程中微观主体的决策为:对于农村劳动力来说,其一方面需要决定是否向城市转移,同时在向城市转移过程中需要决定以何种方式转移,如是选择兼业方式还是全职方式;对于厂商来说,其

^①为了便于说明,在本文模型中,市场化改革仅仅体现为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交易效率的提高。

^②在不作出说明的情况下,模型的设定主要参考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相关基础模型,这些模型的具体建模技术可参见杨小凯(1998, 2003)。

一方面需要决定以何种方式来招聘农村劳动力,同时还要决定招聘多少农村劳动力。具体来说,模型的基本特点有:(1)把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看作分工结构演化的过程。^①具体操作是根据农村劳动力和厂商之间的相互决策来确定不同的分工结构,如农村劳动力选择兼业方式进入城市工厂工作就属于部分分工结构,而选择全职方式则属于完全分工结构。(2)考虑农村劳动力和厂商之间在劳动市场上相互决策的“谈判能力”。目前已有文献从劳资谈判能力的角度来研究劳动收入占比问题,如 Blanchard 和 Giavazzi (2003)、Bental 和 Demougin (2010)等。根据这类文献的研究思路,本文也把微观主体的谈判能力纳入理论模型。在本文模型中,农村劳动力和厂商在劳动市场上的“谈判能力”直接决定着哪种分工结构的出现,从而影响劳动收入占比水平。如果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那么厂商就具有更强的“谈判能力”,此时厂商的决策行为决定一般均衡分工结构的出现。(3)考虑市场化改革的影响。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通常伴随着市场化改革,这一点在中国尤其如此,因此,市场化改革必然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微观主体的决策行为。由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模型可知,交易效率是影响分工结构的核心变量^②,具体到本文模型,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交易效率是影响农村劳动力和厂商相互作出决策的核心变量,因为农村劳动力和厂商的决策就是选择最优的分工结构。

基于上述模型思路与特点,考虑一个拥有城市和农村的经济体,其中有两种产品供经济主体生产和消费,一种为农产品 x ,一种为非农产品 y (y 的生产需要投入一种中间产品或生产环节 z)。所有的经济主体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都需要消费农产品 x 和非农产品 y),可以表述为生产者-消费者。假定城市内的经济主体是厂商(厂商也是消费者),其总量为 M 。厂商只生产非农产品 y 。由于本文的研究背景集中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之上,所以假定厂商雇佣农村劳动力来从事 z 的生产。^③在劳动市场中,如果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那么厂商的“谈判能力”比农村劳动力更强(当然,也有一些制度安排会影响厂商和农村劳动力之间的“谈判能力”,如户籍制度就降低了农村劳动力的“谈判能力”),其决策行为直接决定一般均衡分工结构。设定 z 的生产函数为:

$$z^p = \text{Max}\{0, L_z - c\} \quad (1)$$

农产品 x 和非农产品 y 的生产函数参考 Cheng 和 Zhang (2006) 的建模技术,分别设为:

$$x^p = x + x^s = bL_x; y^p = y + y^s = a(z^p)^\beta L_y^{1-\beta} \quad (2)$$

在这三个式子中, z^p 、 x^p 和 y^p 分别表示 z 、 x 和 y 的生产量, L_z 、 L_x 和 L_y 分别表示 z 、 x 和 y 在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劳动量, x 表示农产品自给量, x^s 表示农产品供给量, y 表示非农产品自给量, y^s 表示非农产品供给量, b 和 a (都为正数) 分别表示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生产率, c ($c \in (0, 1)$) 表示从事 z 生产时的固定学习成本。假定每个经济主体(包括厂商)的劳动禀赋为 1。为了简便又不失一般性,令 $\beta = \frac{1}{2}$ 。经济主体的预算约束如下:

$$p_x(x^s - x^d) + p_y(y^s - y^d) = 0 \quad (3)$$

其中, p_x 和 p_y 分别表示农产品 x 和非农产品 y 的市场价格。假定农村中的经济主体总量

①本文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从而促进分工结构的演进看作一种城乡二元转换过程。

②相关基础模型可见杨小凯(1998)。

③在厂商雇佣农村劳动力进行生产的条件下,厂商的生产行为仅仅体现为组织生产。

为 N , 且所有经济主体都是同质的。根据本文研究目的, 我们重点考虑以下几种微观主体: 第一种为 xy , 表示在农村中自给自足农产品 x 和非农产品 y , 根据杨小凯 (2003) 的研究^①, 这类经济主体可被看作农村剩余劳动力; 第二种为 x/y , 表示在农村中专业生产农产品 x , 并在市场上供给农产品 x 以购买非农产品 y , 这类经济主体可被看作“专业农民”; 第三种为 L_z/xy , 表示进入城市厂商的工厂工作以获得工资, 从而在市场上购买农产品 x 和非农产品 y , 这类经济主体可被看作“全职工人”^②; 第四种为 xL_z/y , 表示自给自足农产品, 同时进入城市厂商的工厂生产 z 并获得工资, 从而从市场上购买 y , 这类经济主体可被看作“兼业工人”^③; 第五种为 y/xL_z , 表示生产非农产品 y , 但雇佣农村劳动力生产 z , 并从市场上购买农产品 x , 即表示城市中的厂商。所有经济主体的效用函数设为:

$$U = (x + kx^d)(y + ky^d) \quad (4)$$

其中, x^d 和 y^d 分别表示农产品 x 和非农产品 y 的购买量。用 $1 - k_g$ ($k_g \in (0, 1)$) 表示产品市场中出售商品时所产生的单位交易成本, 则 k_g 为这一交易过程的交易效率。因此, 农产品的买方实际所得到的购买量为 $k_g x^d$, 非农产品的买方实际所得到的购买量为 $k_g y^d$ 。同样设 k_l ($k_l \in (0, 1)$) 表示劳动市场的交易效率。

三、城乡二元结构转换过程中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分析

经济体中总共有 5 种微观主体, 其中农村中有 4 种, 城市中有 1 种。这几种经济主体分别为 xy 、 x/y 、 L_z/xy 、 xL_z/y 和 y/xL_z 。接着根据模型设定分析这几种经济主体的具体决策结果。其中, 经济主体的决策^④为:

$$\begin{aligned} \text{Max } U_{xy} &= xy \\ \text{s. t. } y &= a(z^p)^{\frac{1}{2}} L_y^{\frac{1}{2}} \\ x &= bL_x \\ z^p &= \text{Max}\{0, L_z - c\} \\ L_x + L_y + L_z &= 1 \end{aligned} \quad (5)$$

据此可求得经济主体的均衡效用:

$$U_{xy} = ab \left(\frac{c}{2} - \frac{1}{2} \right) \left(\frac{c}{4} - \frac{1}{4} \right) \quad (6)$$

同样可求出经济主体 x/y 的决策均衡解: x 的供给量; y 的需求量; 经济主体的间接效用函数:

$$x^s = \frac{1}{2b}; y^d = \frac{bp_x}{2p_y}; U_{x/y} = \frac{k_g b^2 p_x}{4p_y} \quad (7)$$

分别令 L_z^s 表示经济主体在劳动市场中的劳动供给量, w 为工资率, L_z^d 表示对劳动的需求量, 则可求出经济主体 L_z/xy 、 xL_z/y 和 y/xL_z 的决策均衡解分别为:

①杨小凯 (2003) 指出, 那些自给自足的经济主体看起来像失业, 因为他们不能在市场上找到工作。

②这类经济主体已完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 成为真正的市民。

③这类经济主体并未完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 没有成为真正的市民。

④其他经济主体的决策也是这样得到的, 下文不再给出其他经济主体的具体决策。

$$x^d = \frac{w}{2p_x}; y^d = \frac{w}{2p_y}; U_{L_z/xy} = \frac{k_g^2 w^2}{4p_x p_y} \quad (8)$$

$$L_z^s = \frac{1}{2}; y^d = \frac{w}{2p_y}; U_{xL_z/y} = \frac{bk_g w}{4p_y} \quad (9)$$

$$L_z^d = \frac{w^2 c + \frac{1}{4} p_y^2 k_L^2 a^2}{w^2 k_L}; y = \frac{\left(\frac{1}{8} p_y^2 k_L^2 a^2 - \frac{1}{2} w^2 c \right)}{w p_y k_L}; y^s = \frac{\frac{3}{8} p_y^2 k_L^2 a^2 + \frac{1}{2} w^2 c}{w p_y k_L},$$

$$x^d = \frac{\frac{1}{8} a^2 p_y^2 k_L^2 - \frac{1}{2} w^2 c}{w p_x k_L}; U_{y/xL_z} = \frac{k_g (4w^2 c - p_y^2 k_L^2 a^2)^2}{64 w^2 p_x k_L p_y} \quad (10)$$

5种经济主体共同的决策可形成许多种分工结构,结合文定理^①和本文的研究重点,我们将选择以下几种分工结构展开讨论^②:(1)结构A,该结构包括的经济主体有 xy 、 x/y 、 xL_z/y 和 y/xL_z ;(2)结构B,该结构包括的经济主体有 xy 、 x/y 、 L_z/xy 和 y/xL_z ;(3)结构C,该结构包括的经济主体有 x/y 、 xL_z/y 和 y/xL_z ;(4)结构D,该结构包括的经济主体有 x/y 、 L_z/xy 和 y/xL_z 。在这4种结构中,结构A和结构B都存在 xy 一类经济主体,意味着这两种结构都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而结构C和结构D都不存在 xy 一类经济主体,意味着这两种结构都不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了具体地考察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接下来将运用MATLAB7.0软件进行数值模拟。由于影响分工结构的核心变量是交易效率,所以在数值模拟过程中,重点解析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交易效率对微观主体经济行为的影响。相关参数赋值如下: $a=5, b=2, c=\frac{1}{2}, N=1\ 000, M=100$ ^③。下面首先求出每种分工结构中各种经济主体的均衡效用^④。

(1)结构A。在结构A中,由于农村中所有的经济主体是同质的,所以其中的三种经济主体必定获得相等的均衡效用,即 $U_{xy} = U_{xL_z/y} = U_{y/xL_z} = ab \left(\frac{c}{2} - \frac{1}{2} \right) \left(\frac{c}{4} - \frac{1}{4} \right)$ 。根据上文求得的各种间接效用函数,由 $U_{xL_z/y} = U_{x/y}$ 和 $U_{xy} = U_{y/xL_z}$ 可求出:

$$p_x = \frac{w}{2}; p_y = \frac{8k_g w}{5} \quad (11)$$

把(11)式及相关参数的取值代入厂商的间接效用函数,可求得其均衡效用为:

$$U_{y/xL_z} = \frac{5}{64} \cdot \frac{(32k_L^2 k_g^2 - 1)^2}{kL^2} \quad (12)$$

①文定理可表述为:最优决策不会卖一种以上的产品,不会同时卖和买同种产品,不会买和生产同种产品。该定理的具体证明过程见杨小凯(2003)。

②有的分工结构经证明不可能成为一般均衡结构,这类分工结构本文也不考虑。

③赋值依据以下原则:一是考虑理论上参数本身的属性,如固定成本 c 介于0到1之间,那么 c 的取值必须在0和1之间;二是考虑现实中的具体情况,如一般而言,在发展中国家,非农产品比农产品的生产率要高,那么在设定 b 和 a 的值时赋予 b 更小的值。另外,借鉴陈良文和杨开忠(2007)在数值模拟中的参数赋值方法,这里 M 和 N 的赋值只是相对的数值,并不代表绝对值的含义,但这不会影响本文分析的基本结论。为了保证可比性,这些参数的赋值在接下来所有的数值模拟过程中都不变。

④所有结构的求解方法相同,具体求解方法如下:在上文求出的各种经济主体的决策均衡解的基础上,利用效用均等条件(事前同质的经济主体获得的均衡效用必定相等)和市场出清条件(这里包括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来求解均衡效用。每种结构只给出重要均衡解的表达式,具体的计算过程不再赘述。

(2) 结构 B。根据效用均等条件(这里是 $U_{Lz/xy} = U_{x/y} = U_{xy} = ab\left(\frac{c}{2} - \frac{1}{2}\right)\left(\frac{c}{4} - \frac{1}{4}\right)$) 和市场出清条件求得厂商的均衡效用为:

$$U_{y/xLz} = \frac{5}{64} \cdot \frac{(32k_L^2 k_g^3 - 1)^2}{k_L^2 k_g} \quad (13)$$

(3) 结构 C。根据效用均等条件(这里是 $U_{xLz/y} = U_{x/y}$) 和市场出清条件求得农村经济主体和厂商的均衡效用分别为:

$$U_{x/y} = U_{xLz/y} = \frac{5k_g \sqrt{6k_L}}{4 \sqrt{10k_L + 1}}; U_{y/xLz} = \frac{5}{36} \cdot \frac{\sqrt{6}(5k_L - 1)^2 k_g}{\sqrt{10k_L + 1} k_L} \quad (14)$$

(4) 结构 D。根据效用均等条件(这里是 $U_{x/y} = U_{Lz/xy}$) 和市场出清条件求得厂商的均衡效用和农村经济主体的均衡效用分别为:

$$U_{y/xLz} = \left(2 \sqrt{\frac{20k_L^{3/2} - k_g^{1/2}}{\sqrt{k_g} + 8}} - \frac{30k_L k_g - k_g + 4 \sqrt{k_g}}{\sqrt{(k_g^2 + 8k_g^{3/2})(20k_L - 1)}} \right) \frac{50k_L k_g^{3/2} - 5k_g^{3/2} - 20k_g}{4 \sqrt{2k_L}(k_g + 8 \sqrt{k_g})};$$

$$U_{x/y} = U_{Lz/xy} = \frac{5k_g^{3/2}(k_g + 8 \sqrt{k_g})\sqrt{2k_L}}{4 \sqrt{k_g^{3/2}(\sqrt{k_g} + 8)(20k_L - 1)}} \quad (15)$$

在求得每种分工结构均衡效用的基础上,我们就可分析各个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因为他们的行为目标是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最大均衡效用的分工结构。接下来将按照这一思路运用数值模拟方法来分析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已知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交易效率都介于 0 和 1 之间,同时考虑到现实中市场交易效率不会过小,因为过小的交易效率导致市场难以运行,而对于正在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其市场交易效率会不断提高。因此,不失一般性,在数值模拟过程中设定它们都介于 0.3 和 0.9 之间。基于此,把 k_g 的取值分别设定为 0.3、0.4、0.5、0.6、0.7、0.8、0.9,而 k_L 的取值范围设定在 0.3 ~ 0.9 之间。对于农村经济主体来说,在上述 4 种分工结构中,哪种分工结构能给自己带来最大均衡效用,他们将选择哪种分工结构。因此,通过比较农村经济主体在这 4 种分工结构中的均衡效用,我们可得到如表 1 所示的农村经济主体对 4 种分工结构的具体决策。

表 1 农村劳动力对分工结构的具体决策

k_g 的取值	k_L 的取值范围	分工结构	k_g 的取值	k_L 的取值范围	分工结构
0.3	$0.3 < k_L < 0.9$	A 或 B	0.6	$0.3 < k_L < 0.9$	D
0.4	$0.3 < k_L < 0.66$	A 或 B	0.7	$0.3 < k_L < 0.9$	D
	$0.66 < k_L < 0.9$	D	0.8	$0.3 < k_L < 0.9$	D
0.5	$0.3 < k_L < 0.34$	A 或 B	0.9	$0.34 < k_L < 0.9$	D
	$0.3 < k_L < 0.9$	D			

由表 1 可知,当 k_g 的取值足够小(等于 0.3)时,在 k_L 取值范围的任意区间内,农村劳动力都选择结构 A 或 B;当 k_g 的取值足够大(大于或等于 0.4)时,只要 k_L 的取值也足够大,农村劳动力就会选择结构 D,且随着 k_g 的取值越大, k_L 所需增大的临界值将越小。在结构 A 和 B 中都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且结构 A 还存在“兼业工人”,而结构 D 既无农村剩余劳动力也无“兼业工人”,并且,在农村中的劳动力全部转变为“专业农民”,同时转移到城市工作的经济主体也变为“全职工人”,这说明由结构 A 和 B 向结构 D 演进的过程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兼

业工人”向“专业农民”和“全职工人”转变。因此可得以下推论:

推论 1:对于农村劳动力来说,当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的交易效率足够高时,他们有动力选择结构 D,以实现由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兼业工人”向“专业农民”和“全职工人”转变。

同样,对于厂商来说,在 4 种分工结构中,哪种分工结构能给自己带来最大均衡效用,他们将选择哪种分工结构。通过比较厂商在这 4 种分工结构中的均衡效用,我们可得到如表 2 所示的厂商对 4 种分工结构的具体决策。

表 2 厂商对分工结构的具体决策

k_g 的取值	k_L 的取值范围	分工结构	k_g 的取值	k_L 的取值范围	分工结构
0.3	$0.3 < k_L < 0.64$	B	0.5	$0.5 < k_L < 0.9$	A
	$0.64 < k_L < 0.9$	C			
0.4	$0.3 < k_L < 0.49$	B	0.6	$0.3 < k_L < 0.37$	D
	$0.49 < k_L < 0.74$	C		$0.37 < k_L < 0.9$	A
	$0.74 < k_L < 0.9$	A	0.7	$0.3 < k_L < 0.32$	D
0.5	$0.3 < k_L < 0.33$	B		$0.32 < k_L < 0.9$	A
	$0.33 < k_L < 0.41$	D	0.8	$0.3 < k_L < 0.9$	A
	$0.41 < k_L < 0.5$	C	0.9	$0.3 < k_L < 0.9$	A

由表 2 可知,当 k_g 的取值足够小(小于或等于 0.5)时,只要 k_L 取值也足够小,厂商会选择结构 B;当 k_g 的取值大于或等于 0.6 时,随着 k_g 取值不断变大,只要 k_L 取值足够小,厂商就会选择结构 D。这说明只要 k_g 取值足够小或 k_L 取值足够小,厂商有动力选择结构 B 或结构 D。而结构 B 和结构 D 中厂商在招聘农村劳动力时都招聘为“全职工人”,但与结构 B 相比,所有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结构 D 中都转变为“专业农民”和“全职工人”。当 k_g 的取值足够大(大于或等于 0.4)时,只要 k_L 取值也足够大,厂商都选择结构 A,而在结构 A 中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且厂商在招聘农村劳动力时却只招聘“兼业工人”。因而可得:

推论 2:对于厂商来说,当产品市场或劳动市场的交易效率足够小时,他们有动力以“全职工人”的职位来招聘农村劳动力,其中当劳动市场交易效率足够小而产品市场交易效率增大到一定值时农村剩余劳动力将被全部招聘;而当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的交易效率都足够高时,他们有动力选择结构 A,以“兼业工人”的职位来招聘农村劳动力。

推论 2 背后的经济学解释为,当产品市场或劳动市场的交易效率足够小(即单位交易成本足够大)时,厂商以“全职工人”的职位来招聘农村劳动力,这是厂商的一种无奈之举,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大幅度降低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中巨额的交易成本(如“全职工人”不像“兼业工人”那样需奔波于城乡之间,这可降低劳动市场中的交易成本;住在城市中的“全职工人”可直接在城市中购买厂商的产品,这可降低产品市场中的交易成本;等等)^①;当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的交易效率都足够高时,这两个市场的单位交易成本就足够小,以致厂商并不关心其的存在,他们关心的是以更低的工资来招聘农村劳动力,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和以“兼业工人”的职位来招聘农村劳动力都有利于厂商维持其在劳动市场中具有绝对优势的“谈判能

^①例如,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农村户口难以转变为城镇户口,但一些属于农村户口的人却可通过城市企业在农村的招工而得到城镇户口,从而由农民直接转变为工人。城市企业之所以花“血本”招农民为工人,并解决城镇户口问题,就是为了降低当时高额的单位交易成本。

力”,从而以较低的工资水平来招聘农村劳动力。^①

由推论 1 和推论 2 可知,农村劳动力和厂商的经济行为存在以下矛盾:当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的交易效率足够高时,农村剩余劳动力如进城工作,则有动力转变为“全职工人”,而厂商却有动力维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并只招聘“兼业工人”。由于在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厂商的经济行为起着决定作用,所以当这种矛盾出现时农村劳动力不得不屈服于厂商的决策。

四、城乡二元结构转换过程中劳动收入占比的动态演变

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劳动市场改革总是面临着许多复杂问题。其中一个显著的问题便是与城市当地劳动力的冲突,Cerrutti 和 Bertonecello(2003)就指出,以往的国际经验表明,大量的农村移民往往在社会生活上与城市当地居民产生隔离。正因为如此,城市当地政府及当地居民总是想方设法来加重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的压力。例如,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中国许多城市就颁布了有关农民工就业的管理政策,以保护当地下岗失业工人在就业市场上免于农民工的竞争(Knight,et al.,1999)。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产品市场的市场化改革,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过程中的劳动市场改革就显得更为困难。因此,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过程中,产品市场交易效率要高于劳动市场交易效率。

由于在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厂商的经济行为起着决定作用,所以哪种分工结构的出现由厂商对分工结构的具体决策来决定。上文已给出了厂商对分工结构的所有具体决策,接着我们在此基础上考察产品市场交易效率高于劳动市场交易效率的具体决策(见表 3)。

表 3 k_g 大于 k_L 情况下厂商对分工结构的具体决策

k_g 的取值	k_L 的取值范围	分工结构	k_g 的取值	k_L 的取值范围	分工结构
0.4	$0.3 < k_L < 0.4$	B	0.6	$0.37 < k_L < 0.6$	A
0.5	$0.3 < k_L < 0.33$	B	0.7	$0.3 < k_L < 0.32$	D
	$0.33 < k_L < 0.41$	D		$0.32 < k_L < 0.7$	A
	$0.41 < k_L < 0.5$	C	0.8	$0.3 < k_L < 0.8$	A
0.6	$0.3 < k_L < 0.37$	D	0.9	$0.3 < k_L < 0.9$	A

由表 3 可知,厂商选择结构 C 所要求的条件非常严格,且与其他分工结构相比其选择结构 C 的概率非常低,说明结构 C 在城乡二元转换过程中出现的可能性非常小。当结构 B 成为一般均衡结构时,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的交易效率都足够低,此时厂商以“全职工人”的职位来招聘农村劳动力。由上文分析可知,如此选择是厂商的一种无奈之举。与此同时,由于结构 B 仍然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而这会降低农村劳动力在劳动市场上的“谈判努力”,所以结构 B 对农村劳动力来说也不利。因此,相对于其他分工结构来说,结构 B 是一种无效率的分工结构。如果这种结构出现的话,那么厂商和农村剩余劳动力都有动力要求政府尽快进行市场化

^①例如,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单位交易成本不断降低,城市私人企业从农村招进来的农民工大多仅仅从事暂时性的工作。

改革,以提高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交易效率,从而使一般均衡分工结构演进到其他分工结构。由此可见,现实中结构 B 基本也不会出现。因此,本文将省去对结构 B 和 C 中劳动收入占比演变过程的分析。

接着考察结构 A 和 D 中劳动收入占比决定的具体情况。本文把劳动收入占比定义为工资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在结构 A 和 D 中,只有经济主体 xL_z/y 获得工资,因此工资总额即为该类经济主体数量与工资水平的乘积。国内生产总值根据宏观经济学中的一般定义^①来计算。在结构 A 和 D 中,最终在市场中进行交易的产品包括产品 x 和 y ,因此结构 A 和 D 中的国内生产总值都是这两种产品的市场价格与市场交易量乘积之和。依据以上计算思路,利用上文相应的均衡解可求得结构 A 和 D 的劳动收入占比分别为:

$$R_A = \frac{1}{64} \cdot \frac{1 + 32k_L^2 k_g^2}{k_L^2 k_g^2}; R_D = \frac{8\sqrt{k_g} + 20k_L k_g}{4\sqrt{k_g} + 110k_L k_g - 5k_g} \quad (16)$$

根据每种结构的劳动收入占比表达式和表 3,通过数值模拟得到结构 A 和 D 中劳动收入占比的演变过程(如图 1 和图 2)。图中横轴和纵轴分别表示劳动市场交易效率和劳动收入占比。根据表 3,结构 A 中只模拟 k_g 分别为 0.6、0.7、0.8 和 0.9 时的劳动收入占比,结构 D 中只模拟 k_g 分别为 0.5、0.6 和 0.7 时的劳动收入占比。从图中可发现,在每种结构中,劳动收入占比随着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交易效率的提高而降低。因而可得:

推论 3:在城乡二元转换过程中,劳动收入占比随着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交易效率的提高而降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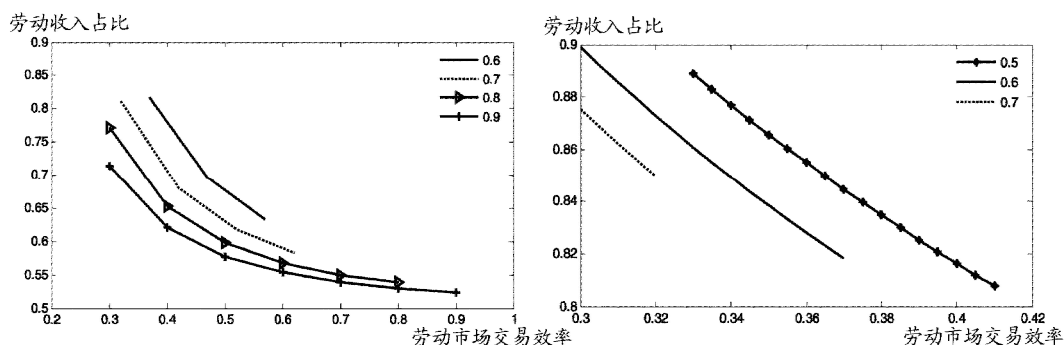


图 1 结构 A 中劳动收入占比的演变

图 2 结构 D 中劳动收入占比的演变

再来具体分析每种结构中劳动收入占比演变的具体情况。在结构 A 中,劳动收入占比随着产品市场与劳动市场交易效率的提高从数值约为 0.86 一直下降到 0.53 左右,而在结构 D 中,劳动收入占比随着产品市场与劳动市场交易效率的提高仅仅从数值约为 0.9 下降到 0.81 左右。这说明结构 D 中劳动收入占比相对于结构 A 来说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变动幅度较小,且数值更大。与结构 A 不同的是,结构 D 中不存在“兼业工人”和农村剩余劳动力,此时这两种经济主体都转变为“专业农民”和“全职工人”。因而可得:

推论 4:在城乡二元转换过程中,“兼业工人”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专业农民”和“全职工人”的转变可使劳动收入占比在产品市场与劳动市场交易效率变化时保持更强的稳定性,且数值还会显著变大。

^①宏观经济学中把国内生产总值定义为特定时期内一国境内所生产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

五、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成因及其化解机制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劳动收入占比出现了持续下降的趋势(罗长远、张军,2009;张杰等,2012;罗长远、丁纯,2012)。对此,我们将运用上文的理论模型试图给出合理的解释。毫无疑问,在这期间,中国既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存在“兼业工人”,这正好对应于结构 A。由上文分析可知,由于结构 A 中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所以厂商在劳动市场上具有更强的“谈判能力”,其行为决策具有决定作用(现实中一些制度安排还会进一步加强这种作用,如户籍制度以及城市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等)。在这种背景下,厂商的行为决策直接决定整个分工结构的均衡结果,这与中国的现实情形是相符的^①。由推论 3 和 4 可知,在结构 A 中,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劳动收入占比随着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交易效率的提高而下降,且下降幅度相对较大。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走上了市场化改革的道路,特别是 1992 年 10 月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极大地推进了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具体到改革难度相对较大的劳动市场,在 1996 年,以国有企业富余职工下岗再就业为核心事件的劳动力市场改革突然加速,正因为如此,1996 年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分水岭,且在随后的短短几年间中国基本完成了市场化就业体制的构建(陆铭、蒋仕卿,2007)。由此可见,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在 1992 年后开始快速推进,在劳动市场方面更是如此。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的交易效率得到了快速提升,如樊纲等(2010)计算的关于各省市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的相关数据显示,各省市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在 1997-2007 年都提高了许多。在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背景下,随着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交易效率的快速提升,中国劳动收入占比必然不断下降。

由上文的研究结论可预测,提高农村劳动力在劳动市场上的“谈判能力”,促进分工结构由结构 A 向结构 D 演进,以消除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兼业工人”向“全职工人”的转变,可能有效改善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为了证明这一点,接着分析农村劳动力和厂商在劳动市场上处于平等地位时劳动收入占比的演变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哪种分工结构的出现由双方经济行为的相互作用确定。基于这一思路,同样考虑 k_g 大于 k_L 的情况,我们得到农村劳动力和厂商基于不同的 k_g 和 k_L 共同选择的各种分工结构(见表 4)。由表 4 可知,在农村劳动力和厂商在劳动市场上处于平等地位时,只有结构 D 才可能成为一般均衡结构。

表 4 农村劳动力和厂商基于 k_g 大于 k_L 对分工结构的具体决策

k_g 的取值	k_L 的取值范围	分工结构	k_g 的取值	k_L 的取值范围	分工结构
0.4	$0.3 < k_L < 0.4$	D	0.7	$0.3 < k_L < 0.37$	D
0.5	$0.3 < k_L < 0.41$	D	0.8	$0.3 < k_L < 0.35$	D
0.6	$0.3 < k_L < 0.38$	D	0.9	$0.3 < k_L < 0.34$	D

根据上文求得的结构 D 中劳动收入占比表达式和表 4,通过数值模拟得到在农村劳动力和厂商在劳动市场上处于平等地位时劳动收入占比的演变情况(如图 3)。图中横轴和纵轴分

^①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厂商在招聘农民工时具有绝对优势,其中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是这种绝对优势的集中反映。

别表示劳动市场交易效率和劳动收入占比。根据表 4, 图中只模拟 k_g 分别为 0.4、0.5、0.6、0.7、0.8 和 0.9 时的劳动收入占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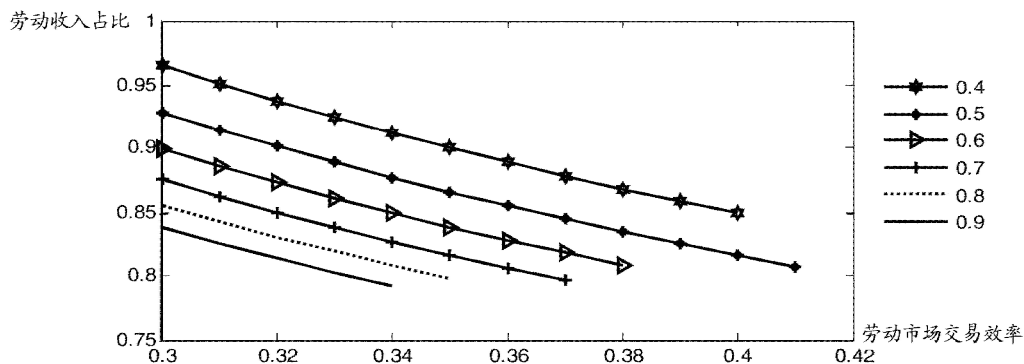


图3 农村劳动力和厂商处于平等地位时劳动收入占比的动态演变

由图 3 可知,随着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交易效率的变化,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范围大约控制在 0.79 到 0.97 之间。与结构 A 相比(如图 1),此时劳动收入占比随着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交易效率的变化保持更强的稳定性,且数值显著变大。这说明由结构 A 向结构 D 转变,不仅能够减缓在市场化程度较高时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对劳动收入占比的负面效应,而且能够显著提高劳动收入占比水平。而结构 A 向结构 D 的转变,意味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兼业工人”向“专业农民”和“全职工人”的转变。因此,提高农村劳动力在劳动市场中的“谈判能力”,促进分工结构转换,以消除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兼业工人”向“全职工人”的转变,的确可以有效扭转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不利局面。由此得到,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成因及其化解机制的具体逻辑框架可参考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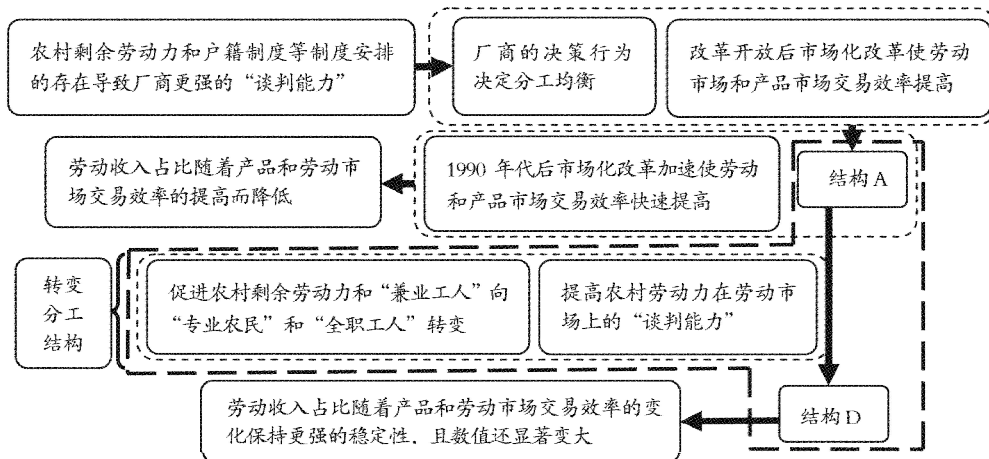


图4 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成因及其化解机制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新兴古典经济学模型的微观框架,在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作为切入点来研究城乡二元转换过程中劳动收入占比的演变规律,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进行解释,并演绎出相应的化解机制。主要的研究结论及其启示有:

(1)在城乡二元转换过程中,劳动收入占比随着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交易效率的提高而降低。而另一方面,对于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来说,促进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交易效率提高的市场化改革是其取得经济增长的有效举措^①。我们如何来面对这种两难局面呢?在改革初期,劳动收入占比并不处于低位,但经济增长水平极其低下,此时推进经济增长相对来说显得更为重要,而且相对较大的劳动收入占比就是降低一定幅度也不构成问题。然而,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已取得巨大进步,劳动收入占比却降为较低水平^②的今天,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无疑面临着两个两难选择:一方面,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可促进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所引起的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交易效率的提高又会使得较低水平的劳动收入占比进一步恶化。根据本文研究,由结构A向结构D的转变能够减弱在市场化程度较高时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对劳动收入占比的负面效应。而这种分工结构的演进实质上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兼业工人”向“专业农民”和“全职工人”的转变。据此,为了化解这种两难选择,当前在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同时,首要任务要有序推进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因为这一举措不仅可以促进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真正市民化而成为“全职工人”,而且有利于仍然留在农村的农村劳动力实现规模化生产,从而转变为“专业农民”。

(2)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成因在于,在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随着中国走上市场化改革的道路,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的交易效率得到了一定提高,这种条件下在劳动市场“谈判能力”方面具有绝对优势的厂商会选择结构A,此时劳动收入占比就会随着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提高而不断下降。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得出,当农村劳动力和厂商在劳动市场上处于平等地位时,一般均衡结构就由结构A转变为结构D,而这一转变可使劳动收入占比在产品市场与劳动市场交易效率变化时保持更强的稳定性,且数值还会显著变大。据此,为了改善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在仍然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背景下,一项重要的政策措施便是提高农村劳动力在劳动市场中的“谈判能力”。然而,现实中却存在诸如户籍制度等一些严重削弱农村劳动力“谈判能力”的制度安排^③,这对于已因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而在劳动市场上处于劣势的农村劳动力更是雪上加霜。在劳动收入占比已经处于较低水平的当下,这些制度的改革及完善甚至消除应该提上议程。当然,这些制度的改革及完善甚至消除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需要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才可能得到有效解决。为此,为了尽快改善目前较低的劳动收入占比水平,重点应该考虑如何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提高农村劳动力在劳动市场上的“谈判能力”。

(3)本文研究表明,转变分工结构,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兼业工人”向“专业农民”和“全职工人”的转变,可有效扭转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不利局面。目前主流文献通常提出尽快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来改善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如龚刚和杨光(2010)、姜磊和郭玉清

①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已验证了这一观点。

②罗长远和张军(2009)指出,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低于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仅高于拉美一些收入分配严重不均的国家。

③这些制度安排严重延缓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顺利转移,从而滞留了本可市民化的农村劳动力,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累积地“被动增加”。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这种“被动增加”必然削弱农村劳动力在劳动市场上的“谈判能力”。

(2012)等。相对于这些文献来说,这个结论蕴含的政策含义更为全面,具体为:为了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改善劳动收入占比,一要促进仍然留在农村的农村劳动力与其他劳动力进行分工协作,实现农业的专业化生产;二要促进已经转移到城市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向“全职工人”转变,真正实现市民化。第二点与目前主流文献在改善中国劳动收入占比方面提出的政策含义不尽相同,其要求不仅要尽快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还要使吸收到城市就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真正实现市民化,而后者才是重中之重,当然也是难中之难。事实上,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城市部门已经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民工潮”就是明证,但这些被吸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多仅仅是“兼业工人”,难以真正实现市民化。如果这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就业的“兼业工人”长期难以实现市民化,那么中国业已较低的劳动收入占比不仅不能得到改善,而且在城市内部还会形成城市已有居民和这些转移到城市就业的“兼业工人”之间的二元分割,从而使得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问题转变为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问题。

参考文献:

1. 白重恩、钱震杰,2010:《劳动收入份额决定因素: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世界经济》第12期。
2. 陈良文、杨开忠,2007:《集聚与分散: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外部规模经济效益的整合研究》,《经济学(季刊)》第1期。
3. 樊纲、王小鲁、朱恒鹏,2010:《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9年报告》,经济科学出版社。
4. 龚刚、杨光,2010:《从功能性收入看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5. 姜磊、郭玉清,2012:《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为什么趋于下降?——基于二元经济模型的观察与解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1期。
6. 李稻葵、刘霖林、王红领,2009:《GDP中劳动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经济研究》第1期。
7. 陆铭、蒋仕卿,2007:《重构“铁三角”: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管理世界》第6期。
8. 罗长远、丁纯,2012:《欧洲国家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成因及对中国的启示》,《欧洲研究》第3期。
9. 罗长远、张军,2009:《经济发展中的劳动收入占比:基于中国产业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10. 罗长远、张军,2009:《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经济学解释——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管理世界》第5期。
11. 唐东波,2011:《全球化与劳动收入占比:基于劳资议价能力的分析》,《管理世界》第8期。
12. 伍山林,2011:《劳动收入份额决定机制:一个微观模型》,《经济研究》第9期。
13. 杨小凯,1998:《经济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4. 杨小凯,2003:《发展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5. 张杰、卜茂亮、陈志远,2012:《中国制造业部门劳动报酬比重的下降及其动因分析》,《中国工业经济》第5期。
16. Acemoglu, D. 2003. "Labor - and Capital - Augmenting Technical Change."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1):1 - 37.
17. Askenazy, P. 2005. "Trade, Services, and Wage Inequality." *Oxford Economic Papers*, 57(4):674 - 692.
18. Bentolina, S., and G. Saint - Paul. 2003. "Explaining Movements in Labor Income Share." *Contributions to Macroeconomics*, 3(1):1101 - 1136.
19. Blanchard, O., and F. Giavazzi. 2003.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Regulation and Deregulation in Goods and Labor Market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3):879 - 907.
20. Bental, B., and D. Demougin. 2010. "Declining Labor Shares and Bargaining Power: An Institutional Explanation."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32(1):443 - 456.
21. Cerrutti, M., and R. Bertonecello. 2003. "Urbanization and Internal Migration Patterns in Latin America." Paper Prepared for Conference on African Migr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4 - 7

- June.
22. Cheng, W. , and D. Zhang. 2006. "Domestic and Global Sourcing." *Division of Labor & Transaction Costs*, 2(1):37 – 53.
 23. Decreuse, B. , and P. Maarek. 2008. "FDI and the Labor Shar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Theory and Some Evidence." MPRA Paper, No. 11224.
 24. Harrison, A. 2005. "Has Globalization Eroded Labor's Share? Some Cross – Country Evidence." MPRA Paper, No. 39649.
 25. Hutchinson, J. , and D. Persyn. 2012. "Globalisation, Concentration and Footloose Firms: In Search of the Main Cause of the Declining Labour Share."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148(1):17 – 43.
 26. Kabaca, S. 2011. "Labor Share Fluctuations in Emerging Markets: The Role of the Cost of Borrowing." Koc University – TUSIAD Economic Research Forum, Working Paper 1122.
 27. Kessing, S. G. 2003. "A Note on the Determinants of Labour Share Movements." *Economics Letters*, 81(1):9 – 12.
 28. Knight, J. , L. Song, and J. Huaibin. 1999. "Chinese Rural Migrants in Urban Enterprises: Three Perspectives."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35(3):73 – 104.
 29. Kongsamut, P. , S. Rebelo, and D. Xie. 2001. "Beyond Balanced Growth."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8(4):869 – 882.
 30. Marcela, C. , and B. Rodolfo. 2003. "Urbanization and Internal Migration Patterns in Latin America." Paper Prepared for Conference on African Migr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4 – 7 June.

The Evolution of Labor Income Share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 rural Dual Conversion

Zhang Songlin¹, Sun Wenyuan¹ and Cheng Yao²

(1: Institute for the Division of Labor & Infra – marginal Economics,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2: School of Public Economics,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Abstract: Based on the micro – framework of the new classical economics, we use the migration of suburbanites to the urban setting on the background of China's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as the entry point to study labor income share dynamics. On the one hand, when transaction efficiency in the product and labor markets is highly promoted by the market – oriented reforms, the rural laborer has incentive to become a full – time worker, while the firm which has an absolute advantage of bargaining power in the labor market prefers to recruit part – time workers and chooses to maintain the existence of surplus rural labor force to consolidate its dominant posi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labor income share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ransaction efficiency in product and labor markets. The above two points contribute together to the decline of labor income share in China. Therefore, improving bargaining power of the rural labor force and changing division structure in the labor market help to realize the shift from surplus rural labor force and part – time workers to professional farmers and full – time workers, which can not only weaken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further market – oriented reforms on labor income share but also actually increase the labor income share.

Key Words: Rural Labor Force; Transaction Efficiency; Labor Income Share

JEL Classification: R00, I80, N60

(责任编辑:陈永清)